

时代、记忆与伦理：电视剧《人世间》的“平民史诗”叙事研究

□刘鹏¹

(1.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511370)

[摘要]电视剧《人世间》对“光字片”这一空间的诗学书写,营造了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精神原乡。在这一空间之上,继而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与国企改革,呈现为一段可被理解与感受的集体记忆,并以春节循环性的仪式时间,为那段历史注入伦理与情感。其次时空叙事所承载的伦理思考,凝聚在对周家人物塑造之上。通过对其成员不同道路选择与价值坚守的辩证呈现,剧作最终确证了一种以情义为内核的、在地的道德伦理价值。故《人世间》的成功标志着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重要伦理转向,在宏大历史之外,重新发现普通人日常生命经验的本体论意义,为回应现代性进程中的伦理焦虑与精神困境,提供了一次强有力的审美实践。

[关键词]《人世间》;集体记忆;平民;史诗

一、“光字片”的空间叙事与伦理建构

电视剧《人世间》的叙事,始于对“光字片”这一特定空间的诗学建构。作为剧情展开的物理背景和象征意义的符号,“光字片”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伦理观念。剧作通过对“光字片”物质环境的逼真再现与其中人际交往逻辑的深度刻画,成功构建了一个作为全剧伦理基石的共同体场域。

(一) 作为精神原乡的物理空间

随着地方概念从区域地理学向人文地理学转向,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描述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关联。^[1]电视剧《人世间》的叙事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锚定于其对“光字片”这一空间的诗学建构。剧中的这一空间不是单纯的地理背景,而成为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与伦理观念的时空体。通过对“光字片”物

质环境的逆时空性的逼真再现,奠定了全剧平民现实主义叙事的基调,亦同时将一个物理场所,外化为提供着身份认同与存在安全感的精神原乡。

“生活流”最初出现在电影艺术理论之中,正因电影与现实生活之间同短视频一样,具有天然的相近性。^[2]“光字片”的物理形态规定了人物的生存基调,泥泞且长时间没有变化的街道,暗示了在宏大历史进程之外,底层社会某种被悬置的时空状态。而空间的窘迫,则直接转化为家庭伦理的内在张力。周家不足几十平米的平房,在子女陆续返乡后,家中团聚之时周秉昆的出去借住,反映居住功能的饱和,直观地将家庭聚合的温情与空间拥挤的矛盾展现出来。

在此基础上,影像语言将具体的“物”转化为承载着欲望与困境的视觉符码。破旧的家具与修补多次

作者简介:刘鹏,男,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专任教师。

的门窗，是贫困生活的直接症候，而反复出现的那块多年未用的床板，则成为一个凝结着改善生活的沉默符号，在夫妻对话中的反复出现，将家庭内部对于未来的焦虑与希冀凝聚其上。同样，糊窗的报纸与晚餐时突然熄灭的煤气灶，这些细节精准地表征了那个时代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正是这种根植于物质匮乏之上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光字片”的真实性肌理，并使其最终成为一个真实可触的存在论锚点。

（二）熟人社会的交往逻辑与共同体认同

建立在“光字片”物理空间高度密集基础上的，是其独特的熟人社会交往逻辑。电视剧在此生动地再现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由血缘、地缘与人情织就的差序格局社会。^[3]其地方性的社会关系通过一系列不断重复的日常实践，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情感黏性的伦理共同体。

共同体中私人生活的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呈现出高度的“公共化”特征。家庭内部的琐事、子女教育的困扰这些私事几乎无法被限定在私域之内，它们迅速地流转为邻里之间公开谈论与介入的议题。个体始终被置于共同体的凝视与规范之下，其行为必须符合约定俗成的伦理期待。郑娟为压力下的周秉昆熬粥慰藉，这一幕是夫妻情感的私密展演，在邻里眼中，它同样是对“贤妻良母”公共角色的合格扮演。通过这种无处不在的相互参照，最微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也被赋予了确认与再生产社群伦理的功能。也突破了传统差序格局中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身份获取方式。^[4]

共同体的向心力，进而围绕着特定的核心空间与共享仪式来不断凝聚。东北的火炕便扮演了这样一个核心空间的角色，它不仅是家庭生活的物理中心，更是社群交往的剧场。母亲在炕上织毛毯、邻居围坐嗑瓜子聊天的场景，精准地还原了一个以非正式交往来交换信息、巩固情感的社会群落。在此空间中，闲谈本身就是一种维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社会劳动。相似的功能也体现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买猪肉”“分鱼”等事件，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行为，演变为一种共享的仪式。通过这种分配，食物的象征价值被激活，它确认着“我们”是同一个生活共同体中有福同

享的成员。滑冰、去公共澡堂等集体性的休闲活动，则进一步从身体层面强化了这种共在的群体归属感。

对于人物之间的这类交往逻辑刻画，其本质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抱团取暖的生存策略。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光字片”的居民通过深度卷入彼此的生活，由人情世故的互享活动从而造出一个风险共担的情感安全网络。还有剧中频繁出现的聚会场景。因此“光字片”的叙事代表的一种基于情义的、守望相助的社会交往模式。在后续的剧情展演当中为剧中人物遭遇风险，提供了一个伦理缓冲与情感庇护所。

（三）地域风貌的诗学呈现与文化符号

《人世间》的空间叙事除了对“光字片”的内部肌理呈现，进一步拓展至对整个东北地域风貌的诗学呈现。通过将自然地景、承载伦理理想的文化地景以及唤醒集体记忆的标志城景三者交织，为其现实主义底色注入了浪漫主义色彩，从而实现了对地域空间的多层次文化编码。

东北独特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冰雪”被转化为一种核心的视觉主题与象征隐喻。当周秉义与战友们白山老秃顶子的皑皑雪原中艰难跋涉时，那无边无际的白，几乎抹去了地平线，以一种近乎暴力的广袤，将个人的渺小与挣扎凸显得淋漓尽致。漫长冬季的严寒与厚重积雪，在视觉上构建了一种近乎严酷的生存环境，这与剧中人物备受磨砺的生命历程形成了精准的情景互文。冰雪覆盖的广阔天地，既象征着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也为人物的生命经验赋予了一种纯净的独特美学基调。也让电视剧始终保留着浓厚的诗意色彩，避免了其彻底滑向庸常的自然主义。

这种诗学关怀，从自然地景延伸至对城市空间的伦理化建构。^[5]剧中虚构的“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等地名，是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体系，直接投射于地理空间之上的文化实践。空间的伦理化让人物的日常行走，比如去酱油厂上班、去邻居家串门，这些都在无形中践行着一种空间伦理的轨迹。理想的道德秩序被铭刻在街牌之上，而泥泞的现实则在街道本身展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人世间》的核心戏剧性，实现现实主义

向浪漫主义价值的复归。

空间的诗学意蕴，最终在流动的城市记忆符号中得以完成。剧中反复出现的，周秉昆骑着自行车与老式有轨电车并行的画面，缓慢前行的54路有轨电车，伴随着富有节奏的“咣当”声，作为一个具像的地方工业时代遗迹，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记忆之场”。它的“慢”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快”形成了对比，就如同沿着固定轨道运行的宿命感，与周秉昆蹬着自行车奋力前行的个体能动性形成了视觉上的对话。留守者的周秉昆，亦是城市变迁最持久的见证者，因此电车成为了他个人生命历程的忠实伴侣与沉默的对话者。这一意象唤醒了观众对于一个逝去时代的感性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诗意纽带。

二、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叙事策略

《人世间》通过将近五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浓缩于周氏家族的个体命运之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集体记忆重构。剧作并非全景式地罗列历史，而是有选择地聚焦于“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与“国企改革”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在这些节点上，呈现的是宏大历史直接介入并深刻规训着个体经验。

（一）关键历史节点的选择性呈现与重构

《人世间》对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的再现是一次高度选择性的集体记忆重构。剧作精准地选取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与“国企改革”这三个关键历史节点，并将这部分呈现为一个具有内在因果逻辑的创伤、救赎与试炼三段式叙事。通过这一策略，剧作构建了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国家史诗书写，其包括个体的苦难与牺牲，为历史转折的合法性提供了情感基础，并最终通向一个充满阵痛却又未来的新时代。

历史的叙事始于对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铭刻。剧作将历史的残酷性巧妙地内化为家庭内部的伦理困境。街道办事员登门，要求周母在子女中做出二选一的抉择，亦可以看作是宏大政治对微观家庭伦理的一次暴力介入。周母含泪说出的那句“秉昆就去附近的村子插队吧”，既是个体面对历史洪流时的无力，也体现以亲情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坚守。同样，知青们在物质匮乏（郝冬梅同伴手掌被冻脱皮）与精神幻灭（董

卫红为返城而做出的选择）中的挣扎，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实，还为整部剧集的情感结构提供一个平凡人叙事起点，这种集体性的承受，为后续电视剧书写历史转折积蓄了强大的情感能量。

与创伤叙事构成直接对话的，是剧作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希望式书写。它被塑造为一次终结个体困境、并重新为个体改变命运的机会。周秉义与周蓉的成功考学，是对此前所有苦难的涅槃，完美地演绎了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精英叙事。然而，剧作也通过蔡晓光因政审问题而受阻的情节，为这一光明的救赎叙事，引入了一丝复杂的阴影。蔡晓光那句“这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精准地描绘出一代人将全部希望孤注一掷于此的集体焦虑。

在涉及国企改革的部分，剧作直面社会结构性断裂与伦理阵痛。剧中工人身绑炸药与周秉义对峙的场面，是两个时代逻辑的激烈冲撞，象征着以集体为保障的铁饭碗模式的终结。孙赶超的卧轨自尽与肖国庆父亲的冻死街头，这两个极端的死亡意象，在功能方面拒绝单纯的悲情渲染，成为一种为新时代献祭的“象征性牺牲”。他们的被淘汰，在叙事逻辑上为骆士宾等新经济人物的崛起以及周秉昆最终的个体化成功，清空了道德和历史的场域。

通过将改革的代价高度浓缩于几个底层人物的悲剧性消亡之上，《人世间》完成了一次对历史阵痛的审美化处理，既承认其残酷性，又在宏观层面肯定了这场试炼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意义。

（二）作为时间绵延符号的春节仪式

在上述断裂与转折的历史节点之间，《人世间》巧妙地运用了春节文化符号作为维系伦理连续性的仪式。剧中共出现了13次春节场景，每一次都成为周家人聚合离散的缩影，也成为衡量时代变迁的刻度尺。从计划经济时代凭票供应的年夜饭，到市场经济时代日渐丰盛的餐桌，物质的变化直观地呈现了社会的发展。

春节构成了衡量时代变迁的物质刻度尺。电视剧精准地体现在对不同年代年夜饭的物质细节描摹上。1970年代，年夜饭的核心是那盘凭全家肉票积攒而来、必须等父亲周志刚落座才能开动的猪肉炖酸菜。

此刻的匮乏美学白描使得食物本身被赋予了准神圣性，围绕它的等待与分配，成为确认家长权威与家庭凝聚力的核心仪式。

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电视机作为新的家庭成员进入年夜饭场景，年俗从单一的吃，扩展为边吃边看春晚，这标志着大众传媒文化开始渗透进最传统的家庭仪式。而到了新世纪，丰盛的菜肴已不再是叙事的焦点，反倒是年夜饭后家人们的各怀心事与代际疏离，构成了新的戏剧张力。通过年夜饭从匮乏到丰盛再到日常化的演变，剧作将一部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史，巧妙地浓缩于一张小小的家庭餐桌之上。

春节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构成了一个国家权力与家庭伦理进行协商的仪式剧场。1969 年的第一个春节，父亲周志刚在年夜饭桌上宣布再次离家支援大三线，伴随着窗外汽笛的长鸣，这一场景成为国家叙事对家庭伦理的首次介入。此刻，大家的号召压倒了小家的团圆，春节的喜庆氛围被离愁别绪所冲淡。1984 年的第五次春节，则上演了更为复杂的伦理协商，周秉义因陪同岳父处理公务而缺席年夜饭，这标志着传统的血缘伦理开始与官方叙事的伦理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周秉昆在春节期间做出去国企“下海”的决定，代表着个体主义的经济选择，对以稳定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

在经历了一系列由外部历史冲击所导致的伦理断裂后，春节仪式最终承担起伦理修复的功能。无论外界历史如何动荡，无论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如何分化，过年回家这一行为本身，都在不断地确认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的核心地位。它在剧作断裂的历史时间中，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具有稳定感的仪式时间。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场域内，世俗社会中的身份差异被暂时悬置，家庭内部的矛盾得以搁置与和解，传统伦理得以重申与延续。

三、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与价值取向

在“光字片”这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人世间》的核心旨归最终落脚于对人的深刻塑造。剧作超越了对人物的脸谱化处理，转而深入探讨其在历史洪流中的伦理抉择与价值坚守。通过对周氏家族三兄妹不同

生命道路呈现，以及对底层人物德性伦理的彰显，剧作最终完成了一种伦理现实的价值回归，深刻回应了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精神安顿的时代命题。^[6]

（一）周家人的道路分化与生存智慧

在“光字片”这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人世间》通过周家三兄妹迥异的人生道路，展演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伦理选择的深刻故事。他们的命运分化，是在社会结构转型期，两种根本不同的行动逻辑：一种指向外部世界的开拓进取，另一种则植根于内在世界的伦理坚守。^[7]

周秉义与周蓉，作为恢复高考后率先出走“光字片”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命策略内在地遵循着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开放的结构性机遇，将个人价值的实现，高度自觉地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进行捆绑。周秉义的仕途与周蓉的学术追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体寻求人往高处走的最优解。

电视剧并未沉溺于这种成功叙事的光晕，以一种冷静的笔触，辩证地揭示了这种理性选择背后难以避免的伦理代价。周秉义为规避政治风险而与原生家庭在物理与情感上保持的审慎距离，周蓉为追求爱情与自我实现而将女儿冯玥长期流放于秉坤家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对“光字片”这一伦理原乡的亏欠。他们获得了广阔的世界，却也付出了伦理根基被部分悬置的代价。

与兄姐的出走和成功形成镜像般对照的，是周秉昆那看似没有出息的留守。他的生命轨迹，被一种深沉的价值理性所主导。他的行为遵循马克斯韦伯口中的价值理性，并非“这样做能否让我更好”，而是“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良心与情义”。这种价值判断是前反思的且不容置疑的。他选择留在“光字片”，并非缺乏改变命运的能力或欲望，而是在他朴素的伦理天平上，“孝亲”、“担当”、“仗义”这些传统的德性，其分量远远重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因此成为一个伦理的持存者，以自己顽强地维系着周家乃至“光字片”这一熟人社会伦理网络的完整性，成为了在时代洪流中防止家庭彻底失散的压舱石。

电视剧《人世间》最终通过三兄妹在面临人生重

大危机时的相互扶持与情感回归，抵达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主义洞察：工具理性的开拓与价值理性的坚守，或许并非两种互斥的伦理选项，而是一个完整社会肌体中互为补充的两种功能。前者为社会带来活力与发展的可能，后者则为这种发展提供稳定而温暖的伦理基座。这场始于“光字片”的家族内部道路分化，最终如同一条河流的两条支流，于生命的下游重新汇合，共同构成了电视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家庭伦理变迁最为温厚的思考。

（二）“凡人善举”中的伦理内核呈现

《人世间》的伦理核心经由周秉昆与郑娟这两个人物，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被具身化。他们共同构筑了一种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情境伦理，这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疏离进行反拨，在具体的生命情境中，对“善”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

郑娟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化的关怀伦理。她的善举并非诉诸语言，而是铭刻于身体的劳作与承受之中。电视剧的镜头语言反复聚焦于她的这些方面：在照料植物人周母时，郑娟被冻裂长茧的双手、因劳累而浸满汗水的额头，这些特写镜头所呈现的，并不能用一个贤妻良母的符号来概括，而是伦理责任的具身化表征。电视剧中她为训诫周楠而自扇耳光的场景。此处的承受指向一种伦理秩序濒临崩溃时的身体性干预。当父亲这一伦理符号被周楠以“他”来悬置时，郑娟用自身的痛苦，强行将儿子拉回到以父子为基石的伦理关系之中。因此，郑娟的“善”，是沉默的、以身体为代价的、旨在维系最基本人伦关系的具身性关怀。

与郑娟向内的、身体化的道德实践不同，周秉昆是“光字片”这一熟人社会伦理的维系者。他的价值恰恰是通过社会评价对他的“贬低”来反衬的。父亲在火车站对其能力的公开否定（“你拍着良心问一问……你能考上吗？”），是整个社会成功评价体系对秉昆留守价值的漠视。

在社会交往层面，周秉昆的仗义是一种在具体情境中权衡“情”与“理”的实践智慧。他帮助朋友孙赶超、肖国庆，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通过开书店提供工作岗位等方式。也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去求助身居

高位的大哥，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中，人情运作的复杂逻辑也能够在此体现。周秉昆的“善”，是一种动态的、维系共同体情义的道德。

《人世间》通过郑娟的身体化关怀与周秉昆的社会性实践，共同建构的道德伦理图景。它是一种在地的、情境化的伦理。这构成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原则的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回应与补充。

四、结语

原著作者梁晓声的创作初衷，是为普通劳动者在时代变革中的无畏精神立传。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如此界定幸福：幸福在于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德性能使人的生命活动进行得好，然而在现实中，即使一个有德性的灵魂，也并不一定能将生命活动完成得好。^[8]《人世间》通过对周家人这一样本的深度肌理呈现，最终触及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关于伦理的普遍性问题。成功地完成了从历史向诗的转化。

其诗意书写，并非来自浪漫化的抒情或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对普通人伦理尊严的深刻凝视与由衷捍卫。电视剧重新发现并赋予了那些维系着中国社会千年传承的情感纽带与道德基石。本文对于伦理现实主义的 analysis，或可为理解新时代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内在脉络与文化功能，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美) 段义孚著, 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 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
- [2] 王若璇. 人地互构、恋地情结、母题微缩: 短视频的地方形塑与文化传播[J]. 当代电视, 2025, (09): 34-40.
- [3] 陈占江. 固本开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土逻辑——以费孝通著述为中心[J/OL]. 求索, 2025, (05): 112-121 [2025-09-24].
- [4] 杨君, 林星宇, 蒋佳妮. 身份获取与空间再造: 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内生性逻辑[J]. 学习与实践, 2025, (09): 101-113.
- [5] 李之浩. 近年来现实题材剧的美学品格跃迁——风格化叙事、时代精神与意义建构[J]. 当代电视, 2025, (08): 66-70.
- [6] 位迎苏, 裴佳阁. 主旋律背景下的底层叙事——以电视剧《人世间》为例[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 (10): 83-85+94.
- [7] 王楠.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 马克思·韦伯的伦理教育[J]. 社会, 2018, 38(06): 155-179.
- [8] 刘宇. 悲剧、实践智慧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实践哲学[J]. 道德与文明, 2024, (01): 96-111.